

文史資料

第 三 期

(总第 三十五 期)

政协仪陇县委员会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征求意见稿

目 录

朱德关心故乡经济建设纪实.....	李英才
康克清大姐关心朱德故乡的经济建设.....	李英才
朱总巧借方言知真情.....	唐超群
仪陇电厂筹建、发展纪实.....	吴玉书 唐子明

朱德关心故乡经济建设纪实

李 英 才

十七年前，朱德同志与世长辞了。故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

朱德同志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学习、劳动和工作了二十二个春秋。他热爱故乡的山和水，更热爱故乡的父老乡亲。他投笔从戎，走上革命征途后，从来没有忘记过故乡。特别是解放后，他在身负党和国家领导重任的情况下，仍常常想到故乡人民，关怀故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曾多次在北京等地接见仪陇的代表，并题词、写信、赠书，鼓励和教育故乡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朱德同志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应邀参加全国红、烈军属和残、复、转、退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仪陇县马鞍公社社长谭台同志。当谭台同志汇报到马鞍公社的粮食产量比一九四九年翻了一番，社员的生活比从前好了十倍时。朱德同志说：“这还不算好，这才是开端，离社会主义生活水平还远，还得努力，要发动群众多养猪、鸡、兔、羊，别看这些是小事，家家户户都养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了钱，吃、穿、住都好办了。”他一再强调要发展多种经济，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九六〇年三月九日，朱德同志回到了阔别五十二年的故乡，语重心长地对当时的县委领导康志盛和费德政同志说：“仪陇好，山区好，山

区宝藏多，许多方面胜过平坝。只要发动群众，因地制宜，艰苦奋斗，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就一定会有个大发展。”鼓励县委团结一致把仪陇建设好。当听到县委领导汇报到：“公社化后接着改造城市人口，商品、市场没有了，从业人员都下到公社、大队摆摊设店去了，县城人口总计不到五千时。”他老人家说：“人太少了。社会主义还是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同日他老人家在接见当时马鞍山公社党委书记石永瑛同志时也无比关切地说：“山区是个好地方，建设好了是个宝库。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随后又在他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八个字。

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老人家又一次接见了参加会议的费德政同志，再一次强调要把仪陇的经济建设搞好，他非常关心仪陇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并一再询问六〇年回仪陇一路看到的那些秃山头都栽上了树没有，他强调说：“你们要把森林发展起来，过去仪陇的树木多得很呀！到处都是黑压压的，风调雨顺，很少出现天灾呀！仪陇是山区，你们要多种经济林木、药材、茶树，要发展多种经营，多搞点商品拿出去交换，要搞点外汇，一个县不搞点外汇，光靠自给自足的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外汇多了就富起来了。”“你们要组织群众把木本粮、果树发展起来，这些东西过去仪陇是多的。土地也不要光种粮食嘛！可以种些花生、芝麻、黄豆，多养猪、牛、羊，这些

发展多了，自己吃不完，就可以用来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呀！要为群众搞商品交换提供场所，市场还是该恢复起来，应多开些商店方便群众，过去是五里一店，十里一铺，还有茶馆对物资交流也很起作用。城镇的茶馆都应该恢复，它不是游手好闲的场所，而是劳动人民、商人劳累之后娱乐、交流的地方。过去做生意的人要掌握了解行情，就靠坐茶馆。”朱德同志的这些教诲是十分正确的，由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进行着，这些正确的指示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仪陇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重温朱德同志的教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奋力振兴经济，各项事业迅猛发展，人民生活逐年得到改善。

仪陇人民将牢记朱德同志的教导，发扬革命老前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朱总“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坚持改革，锐意进取，振兴经济，建设家园。从仪陇的实际出发，立足基础建设，提高整体效益，积极发展山区优势，开拓振兴之路，为提前翻番，为胜利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奋斗！

康克清大姐关心朱德故乡的经济建设

李 英 才

提起康克清大姐，朱德故乡人民无不感慨万千。仪陇人民怎能忘记一九六零年她陪同朱老总回故乡，深入机关、学校和农村，了解人民的

生活情况，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她亲自找有关部门解决仪陇县农机厂没有运输工具，原料运不进来，产品送不出去困难，一次为该厂解决了三辆解放牌汽车，一九六零年、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一年，她先后三次回到仪陇。谆谆的教导，亲切的关怀言犹在耳。在北京，她多次接见仪陇县党政干部，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做过许多重要指示，每次都要问及家乡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在当前认真贯彻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好形势下，我们重温康大姐的历次教导，无疑将进一步促进仪陇经济的发展。

一九八一年，仪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吴玉书一行三人，于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到康大姐家汇报工作，当汇报到仪陇办经编针织厂问题时，康大姐说：“国家有可能，我赞成。要实事求是，你们积极改变贫穷面貌的精神是好的，我还说不准，办工厂要有原料，你们有水果，有鸡、鸭、猪、羊，可办罐头厂，有粮食可办酒厂，别人卡不住你们。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下出什么，地上长什么，你们去跑一跑，看一看，要把生意做活。你们的酱瓜我早吃上了，组织出口没有？你们的酒也好嘛，贵州有茅台。”当时在场的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吴金盛局长说：“我们搞了土茅台，还成立了食品委员会，生产老人和儿童的食品。”康大姐说：“这很好，四川没有江苏富，如果他们（指仪陇的同志）需要你们支持的话，你们要高抬贵手哟。”吴局长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以后，吴金盛局长的确帮助仪陇办了不少实事）。康大姐又对仪陇的同志说：“四川可养兔嘛，最近我到河北张家口看了他们养兔，又用兔

养雕，每只雕出口卖八十元，冻兔肉出口也很吃香，兔心做药很名贵，兔皮也很好，兔骨粉碎后可作饲料，兔肉胆固醇很低，兔血也有用，兔子全身都是宝。”

一九八三年八月，吴玉书副县长与县经委副主任张朝礼同志，因办厂的问题，又一次到北京找康大姐。她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办针织厂有原料和销路吗？你们想改变落后面貌是对的，如卖不出去，工厂就要倒闭，不要撒了一把米，又失去一只鸡。那样，人民会骂我们的。要办就得办好，产品要花色、品种、质量好，才有销售市场。”这次接见仪陇同志，康大姐还情深意笃的说：“朱老总是四川人，四川是他第一个家，云南是他第二个家，我是江西人，四川是我的婆家，云南也是我的婆家，我对家乡关心不够，请原谅。”

一九八六年二月，仪陇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光远等同志，到北京向康大姐汇报仪陇开展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活动情况时，康大姐说：

“县委发文号召全县向朱总学习，这很好。要把当年的生产搞好，朱总生前特别关心家乡和全国的多种经营生产。学习要有行动，怎么结合，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朱总一生很诚朴，要讲实在的，实事求是的，要见行动。”

一九八六年五月，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馆长肖向成同志到北京向康大姐汇报工作，康大姐说：“我更希望把学习朱德同志落实到生产、工作的实际行动上，让家乡的建设事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开拓前进。”康大姐对仪陇的工业、农业的发展十分关心，她语重心长

地说：“朱总生前特别关心家乡和全国的多种经营生产，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县里不是办了个针织厂吗？无论如何要办好，产品我看了质量很好，要把管理搞好，把销路搞好。”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康克清大姐在北京住所接见了仪陇县委副书记张思智和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当听说仪陇争取上工业项目时，大姐提醒说：“一定要拿准，办就办好，目前办不到的事情，创造了条件再办。”她特别关心家乡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从农业生产到百姓的衣食住行无不问及。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仪陇县委书记李阶生一行三人，到北京康大姐的住处，拜见康大姐，向她汇报了家乡的建县情况。大姐对朱德故乡人民越过了温饱线非常高兴，当听说国家经贸部和成都市对口支援仪陇，取得了好的成绩时，大姐以仪陇人的身份说：“感谢他们对家乡的支援。”一再叮嘱县委领导办工业，项目一定要选准，要同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要讲效益。她生怕办得不好摆下摊子。

重温康大姐的教导倍感亲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仪陇人民，时刻没有忘记朱德、康克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在人平半亩多地的山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胜利的越过了温饱线，不仅养活了九十三万人民，而且解放四十多年来，支援国家粮食六点九亿多公斤。为了纪念康克清大姐逝世一周年，故乡人民以实际行动战地斗天，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仪北公路仪陇段三十九公里多的公路拓宽任务，受到了国家交通部和省、地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仪陇段光缆铺设工程的挖

任务，也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就胜利完工，受到国家邮电部的表扬。

仪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仪陇，不愧为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不愧为朱老总、康大姐的故乡。

朱总巧借方言知真情

唐 超 群

一九六零年三月九日，朱德总司令回到阔别了五十二年的故乡。第二天，朱总巡视了马鞍场，看到街市上到处摆着粮食、猪肉、蔬菜和瓜果，购买的人却寥寥无几。心中不禁生疑。他来到朱家大湾旧居，访问了白发苍苍的丁四太婆，刚见面丁四太婆就“扑通”一声跪在朱总面前连呼：“恩人！”朱总急忙双手扶起老泪纵横的太婆，温和地问寒问暖。当问到近年生活怎样时，太婆看了看随行的人员说：“好！好！”朱总察觉到太婆不是说的真心话，于是起身携着太婆的手，迈出堂房，突然改用家乡方言（广东话）和太婆攀谈起来。太婆也用广东腔诉说真情，听着，听着，朱总的面容慢慢地严肃起来。

朱总从丁四太婆口里得知了“伙食团”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乡亲们生活还很贫苦的真实情况。回到中央后，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不久，“伙食团”撤消了，集体伙食下放到户，又给社员分配了自留地，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仪陇电厂筹建、发展纪实

吴玉书 唐子明

仪陇电厂是川北各县城筹建最早的。1951年2月，川北区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来朱总家乡检查工作，见到这个小山城街道狭窄，还有不少石梯坎，机关职工和居民晚上都用油灯和蜡烛，有的还用火把照明。一到夜晚，街区漆黑一片，犬声此起彼伏。当时，他对县委书记周慎、县长郭宪书说：“你们办个小电厂照明嘛，我给你们批十万斤大米建厂。”消息传出，干部群众莫不欢欣鼓舞。经县委研究成立了“仪陇县人民电厂筹备委员会”，县长郭宪书任主任，指定建设科长康济南（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技术人员，时逢川北行署交通厅工程师程君模到仪陇研究整修南部至巴中段公路和筹建仪马公路事，常和康济南接触，康向他打听办电厂的技术人员，程说：“兰际绶是内行，现家驻重庆市磨儿街，我写个介绍信，你们可去个人联系一下。”康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派县政府秘书唐子明（中国民主同盟南充支部仪陇小组负责人）去重庆。

胡耀邦同志批的十万斤大米很快就拨到了仪陇。变款3000万元（旧币3000万元，折合新币3000元）。1952年2月下旬，唐子明和县法院干部何维友带上路费和程君模的介绍信，从仪陇步行到南充（当时仪陇到南充还没有通车），再乘汽车去重庆。到达重庆的第

第二天，即去磨儿街会见了兰际绥。看了程君模的介绍信后，兰欣然接受了仪陇的邀请，愿意到朱德故乡办电厂。兰际绥那时一家三口人（夫妇俩个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经营一个小米店，生活比较宽裕。他们很好客，除烟、茶之外，还为仪陇的同志准备了丰富的午餐。午餐后，唐子明向兰际绥介绍了仪陇办电厂的筹备情况。兰际绥提出：“30~50 瓩的发电能力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可解决照明用电，还可以搞打米、磨面等加工业。”至于动力设备，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柴油机，这种机器体积小，占地少，但易出故障，而且柴油不易买到（当时国内不产柴油，全靠进口）；另一种是蒸汽机，这要和锅炉配套，这种机器体积大，占地宽，但故障少，用煤炭作燃料。”根据兰际绥的意见，唐子明决定一边请示县委，一边寻找有关部门请教，于是告别兰家，回到旅馆。

第二天，唐子明同何维友搬到重庆夫子池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因为他俩原住民族路太平洋旅馆住宿费太高，每人每夜2万元（即新币2元），而这家小旅馆每人每天才捌千元（即0.80元），且距兰际绥住处又近，便于联系。午饭后，唐、何二人带上县政府的介绍信到西南区工业部设计室请教，设计室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说：“朱总故乡办电厂，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不过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我们不了解，最好去找川北行署工业厅驻渝办事处，他们会帮助你们的。”第二天，唐、何、兰三人到川北行署驻渝办事处（驻两路口），办事处的李主任听了仪陇办电厂的设想后，认为用蒸汽机作动力比较合适，并指定

沈基工程师作具体帮助指导。

唐、何回旅馆后，把在重庆几天联系的情况和对电厂的初步设想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并派何维友专程回县汇报。不几天，县府来电报，同意报告中所提方案，并从银行汇去所需款数。于是唐、兰二人着手采购机器和所需材料。

重庆当时虽然是我国西南的工业重镇，但因解放不久，国营大工厂还处于恢复阶段，私营工厂还在等待观望，只搞些采料加工或修理业务。要从一家工厂购齐发电设备是不可能的，只好四处打听，哪家有我们需要的机器，就到哪家去接洽。因兰际绶对重庆情况较熟悉，终于在西南物资局的几间大仓库里找到了我县需要的30瓩发电机、小水泵、皮带车床各一部，又在私营洪发利机器厂查看了一部30马力的卧式单缸蒸汽机，在宝元煤矿公司库房里找到了高压紫铜线，这些都是旧的，为了稳妥，唐又请沈基工程师一道去查看，证明可用后，才办理采购手续，发电机、水泵、车床是国家处理物资，没花多少钱就购到了。蒸汽机、紫铜线是私营工厂的，价比较高，还得先报价单去重庆信投公司核检，经双方同意后，签订合同付款，开正式发票。唐、兰把这些器材买好后，款就用完了，还有锅炉和大批配件所需款项，只有靠县上再想法筹措。

这段时间，唐又在重庆聘请了一名电工蒲海福和锅炉工姜坤碧（蒲、姜当时均是重庆市劳动局登记的失业工人），县内又找到一位锅炉工叫邓国仁。5月，经县领导同意，唐动员兰际绶的爱人蒋文芳带着孩子一道先到仪陇。唐、兰继续在重庆买锅炉等汇款，看了不少锅炉都不适用，

~10~

于是决定买钢板，找锅炉工加工。县上因一时筹不到这笔款，故去信叫唐回县，再去行署请示。6月底，唐包了一辆大货车将买好的机器、材料运回仪陇。唐随车回仪，兰留重庆继续洽谈锅炉加工事宜。

唐子明回县住了几天，就到南充行署工业厅请款。厅领导说：“仪陇建电厂不在厅的计划项目之内，无法解决。”经再三请求，始答应在行署召开厅、局长联席会议时提出，看能否解决。叫唐等着答复。过了十多天仍无结果，唐子明想去求耀邦同志，怎能见得到呢？于是他又以县政府的名义写了份报告，请他读中学时的班主任、川北区民盟总支部负责人、行署文教厅长贾子群同志转交，并请他代为陈词。这办法果然生效。三天后，行署办公厅通知唐子明去办领粮手续。原来耀邦同志又给仪陇批拨了二十万斤大米作电厂建设资金。唐子明带回了行署粮食厅的拨粮单，由县粮食局变卖后，7月汇款4000万元（合新币4000元）去重庆。不久同马宝华铁工厂签订了加工锅炉的合同，又在一家私营工厂买了钢板送去。筹建委员会一面指派人在重庆等候加工锅炉，购买配件、工具，一面组织人员抓紧修建厂房和县城到潘家桥这段便道，以便运输机器和物资。

加工锅炉最后一道工序是用铆钉把裁好的钢板铆成整体（当时无焊接技术），技术要求高，又必须运到仪陇现场才能组合。同年10月，将锅炉器材等运回仪陇。兰际绥和马宝华工厂选派的六名技工随车到仪陇。

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1952年春节试车发电了。这一喜讯振奋

了全县人民。几十里外的老百姓都到县上看电灯，县政府买的第一套广播器材也同时播音了。这是解放初我县人民最欢乐的一个春节。后来电厂正式命名为“仪陇县人民电力公司”，建设科长康济南兼任电力公司经理，吴玉书任副经理。

为了永久纪念耀邦同志关心仪陇建设电厂，电厂筹建委员会在厂房主墙壁上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是：“仪陇县新工业建设第一基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立”。这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石碑，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县农机厂的发电车间墙壁上。

电厂建起了，春节虽已发电，但机器运转很不正常，时而锅炉供汽不足，时而发电机、变压器又出毛病。当时正是“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由于供电不正常，群众反映强烈，有人怀疑经办人唐子明、兰际绶是否有贪污。1953年3月，在“三反”、“五反”学习班上，唐、兰被审查、批斗，在强烈逼供下，兰际绶“交待”了和马宝华铁工厂有“勾结”，把内径五、八尺锅炉改为外径五、八尺锅炉的所谓“真五、八尺和假五、八尺”的问题。又说：“洪发利机器厂将不足30马力的蒸汽机冒充30马力卖给了仪陇。”（因查无实据，唐、兰免于处分）。有了这一线索，县上立即派电厂干部李弼魁和兰际绶去重庆找两家私营工厂索赔。开始厂方不同意赔偿（锅炉和蒸汽机都是符合规格的），李弼魁便向西南区人民法院申诉。1952年5月，西南区人民法院传讯了两厂资本家。当时，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又正当“五反”时期，资本家害怕构成“偷工减料”罪

行。马宝华铁工厂和洪发利机器厂只得同意赔偿损失。1952年8月，两厂即派人到仪陇了解情况和协商解决赔偿具体事宜。双方议定：“马宝华铁工厂在原锅炉上增加4500×1000的蓄汽包，以解决蓄汽不足的问题，洪发利机器厂赔80马力船用立式双缸蒸汽机一台，原来的30马力蒸汽机不再退回，留给仪陇。”

洪发利赔偿的80马力船用立式双缸蒸汽机，是一台弃置多年未用的旧蒸汽机。运回仪陇后，需要大修。我县没有修理这台机器的技术人员，便四处打听。后来听说南部电厂从川北行署工业厅请的潘金荣技术高明，正帮该厂搞检修。仪陇电厂当即派李弼魁去南部电厂协商，请潘金荣来仪陇。潘金荣检查后认为，这台机器修理工作量太大，要有两名好钳工才能完成修理和安装任务。又经潘金荣介绍，借来了南充私营协诚机器厂的姜麟书（姜是潘的师弟）、从南部农村找来了曾在重庆汽车行业当过修理工的李文岱，开始了紧张的修理、安装工作。吴玉书和潘金荣一道，团结兰际绥、姜麟书、李文岱等同志，带领广大工人，日夜奋战，完成了80马力蒸汽机的修理和安装任务，加好了锅炉上的汽包。1954年春节，这套发电设备投产了，不仅保证了县城的照明，还安装了打米机，开展了机械修理业务。不久，将仪陇县人民电力公司改为仪陇县人民电厂，由康济南兼厂长，吴玉书任副厂长。1956年，县委加强电厂党的建设，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调来向本立任支部书记兼厂长。吴玉书任副厂长，同时免去康济南厂长职务。

1958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总路线指引下，仪陇同全国一样大办工业，大搞土法炼钢铁。电厂修理车间增加到110人（当时全厂总人数是134人），县府决定成立“仪陇综合修造厂”。电厂改为发电车间，向本立任厂长，吴玉书任副厂长，以后又更名为“上游机械厂”、“农业机械厂”。同年冬，调老红军罗文周为该厂的专职支部书记，重点抓机械工业、修造任务，发电车间继续供电。由于县城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电力严重不足，县政府决定扩建电厂。1958年下半年，派吴玉书去重庆购买发电设备，在国家一机部西南销售处购买到了上海造的K₂-13型水管式锅炉一台，运回仪陇才组装。但当时该厂无组合派管技术和设备。1958年9月，派该厂技工任秀伯、高家洪去内江电厂学习后，自制了派管工具。10月进行锅炉安装工作，同时向重庆动力厂购回一台200马力的蒸汽机，但未买到150瓩的发电机。后采纳了潘金荣的建议，从南部县购回一台报废的大直流电机，组织厂内技工改制成150瓩的交流发电机。又扩建了厂房，修建起35米高的烟囱。1959年春，这套发电机组试车投产了，大大缓解了当时我县电力紧张状况。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大跃进时失误，造成物资供应的全面紧张。这套发电机组每天要用8吨煤，^{当时国家不仅无煤可供，}有了煤也缺运力运回，发电不到一年，就被迫停止使用，就连原先的30瓩的蒸汽机发电机组也只得靠买木柴来烧锅炉发电。后来木材也难买到了。1961年秋，从地区工业局调回一台4135型柴油机，配备50瓩发电机。为了减少线损，缩短了输电距离。1962年初，安装在县城状元街发电，供应城区照明。

从此结束了两套蒸汽机发电的历史。

1962年，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落实“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了“仪陇县人民电厂”的建制，由孙洪章任厂长。机械厂大部分职工被动员回到农业第一线，只留下了55名职工，改名为“农具社”（集体所有制），由吴玉书任社主任。由于缺电，退到手拉风箱鼓风，手摇车床作动力的境地，照明用电日趋紧张。

1964年，电厂、农具社合并，又恢复“仪陇县农机厂”，孙洪章任厂长，吴玉书任副厂长。电厂作为“农机厂”的一个车间，新购6135型柴油机一台，配上75瓩发电机，供县城照明，把4135型机组调到潘家桥农机厂供生产用电。

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生产、生活用电急剧增加，出现严重超负荷运行，电灯下面照油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多次冲击发电车间说：“走资派搞鬼，故意不把电灯开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仪陇县的军代表，县人武部的刘友生、冀全恩亲自到发电车间调查，通过了解，认为不是“走资派”搞鬼，确实是发电设备功率太小。他们当即同在县委、县政府主持工作的李万琛研究决定购功率较大的发电设备。1966年10月，派吴玉书和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杨全文去南充向地区工业局汇报。地区工业局又介绍去省经委申请较大的柴油机组。为抓紧时间，吴、杨在南充乘飞机到了成都，立即去省经委（现成都红光路招待所）。当时省经委的造反派已开始制造混乱，吴、杨在接待室汇报，造反派在楼上辩论。

扭打。接待他俩的领导同志当即在介绍信上签了个意见：“请西南机电设备公司解决。”吴、杨庚即去该公司。该公司领导听了汇报，看了省经委签的意见后，同意拨给仪陇一台重庆红岩机器厂制造的低速6250型300马力柴油机，价格58000元。吴立即将情况电报县府领导，并要求汇款6万元。当时县府也无这笔款，经李万琛等同志研究决定，由县水电局从水利建设资金中汇款6万元，买到了这台柴油机。为了运回这台重约8吨的大型机器，吴玉书同志在成都二仙桥大件运输队联系到泰托拉重型汽车一辆，从物资部成都储备局仓库提运回这台大型柴油机。

300马力柴油机需配200瓩发电机。当时缺乏资金，经李金荣建议，请示地区工业局，将华蓥山庆华钢铁厂下马后的一台200瓩的发电机无偿调给仪陇。经请示地区工业局同意，运回了这台发电机。主机购回后，农机厂一面派人购置配件，一面在状元街修缮厂房、改建配电线路。一九六七年，这套200瓩的柴油发电机组正式发电了。由于有了较多的剩余电力，厂里决定修复状元街到农机厂这条供电线路，向农机生产和抽水提供电力。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三结合”阶段，农机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孙洪章任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不久，又把发电车间从农机厂划出，恢复“仪陇人民电厂”，田云明任厂长，并把电厂从农机系统划归县水电局。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用电量日益增大，电厂又新购一台200瓩的发电机，从重庆红岩机床厂购回6250型全套零部件，自己组装一台6250型柴油机，配套成200瓩的发电机组。不久又购回84瓩的发